

中山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

华侨华人研究丛书 ③

美国社会学与亚美 研究学的跨学科构建

一个华裔学者的机缘、挑战和经验

(美) 周 敏 著

(美) 郭 南 审译

中山大学出版社

013046541

D771. 238

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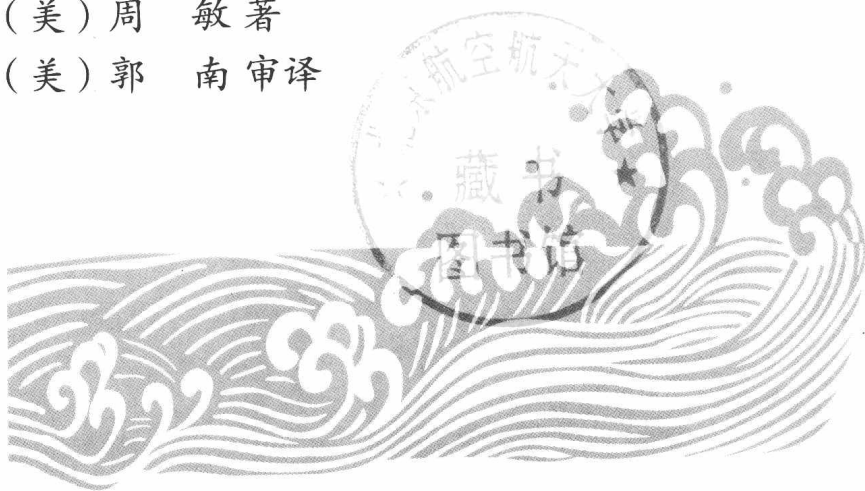
中山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
华侨华人研究丛书 ③

美国社会学与亚美 研究学的跨学科构建

一个华裔学者的机缘、挑战和经验

(美)周 敏 著

(美)郭 南 审译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北航

C165302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社会学与亚美研究学的跨学科构建：一个华裔学者的机缘、挑战和经验 / (美) 周敏著；(美) 郭南审译.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3.5

(华侨华人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306 - 04529 - 4

I. ①美… II. ①周… ②郭… III. ①移民—社会学—研究—美国
IV. ①D771.2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73584 号

出版人：徐 劲

策划编辑：李海东

责任编辑：李海东

封面设计：方楚娟

责任校对：李海东

责任技编：何雅涛

出版发行：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编辑部 020 - 84114366, 84111996, 84113349, 84111997, 8411077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510275 传 真：020 - 84036565

网 址：<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广州中大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787mm × 960mm 1/16 9.5 印张 170 千字

版次印次：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6.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中山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 问 王晓萍 陈春声 林 琳

主 编 刘 宏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柯 王辉耀 龙登高

刘 宏 刘志伟 吴前进

周 敏 范若兰 袁 丁

滨下武志

本书出版得到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与中山大学“985工程”
三期人文社科自主创新建设项目的赞助。

序 言

有道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我踏入社会学领域，随后又与亚裔美国人研究学（Asian American Studies，简称“亚美研究学”）结缘，颇具偶然性。我生长在中国南方珠江三角洲的一个小城镇中山^①，跟我很多的同龄人一样，风云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卷走了我的童年。10岁那年，我父母先后被迫离城接受“再教育”，父亲被下放到边远的海岛，母亲也被送到乡下的“五七干校”^②。带着不足9岁的弟弟和5岁的妹妹，我就被迫早当家了。16岁那年高中毕业，我由于需要照顾家庭而留城，可是却被分配到一所离家30多公里、被一望无际的甘蔗田包围着的榨糖厂工作。在那里我成了工人子弟中学的一名教师，当上了名副其实的孩子王。^③当时大部分真正的中学教师都给赶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我跟同龄人一样，对将来没什么奢想。

还在念中学的时候，我曾经梦想过上大学。可是那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之中，大学只招收由工厂、人民公社和部队直接推荐保送的根红苗正的工农兵学员。直到1977年全国恢复大学入学考试，我才有机会在伏蛰了11年后参加高考，并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为录取率只有4.7%（570万考生中录取了27万人）的幸运儿。我于1978年初入读南方名校中山大学，1982年获英美文学学士学位并留校当助教。同年，我跟大学同学

① 中山市位于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的南部，在澳门和广州的中间。原名香山，历史上是一个小镇，著名侨乡，19世纪中叶有大批移民到海外谋生定居。香山也是一代伟人孙中山先生的故乡，孙中山在1911年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朝而被誉为“现代中国之父”，香山因此改名为中山。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山已经从小城镇发展成为一个有250多万人口的现代化大都市，吸引了无数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高技能人才和农民工。

②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年），许多知识分子、党政干部和国营企业领导被称为“走资派”、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或反革命分子而遭到革职和迫害。他们被下放到农村或“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通过体力劳动来改造资产阶级思想。

③ 当时，所有高中和大学毕业生都由政府分配工作。

郭南 (Sam N. Guo) 恋爱、结婚, 随后生了儿子郭伽 (Philip J. Guo)。大学毕业后的两年, 我和丈夫虽然忙碌, 三口之家的日子却过得快乐充实。我自己的事业也一马平川, 稳稳当当。我当时心安理得, 满足于现状, 从未想过要去考研、深造或者跳槽换工。

然而,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把我引上了留学美国的道路, 让我走进了社会学领域。在我念大学的时候, 没有社会学这门学科^①。中国的社会学和其他一些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一样, 命运多舛, 在 50 年代被视为资产阶级学科而遭取消。直到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才试图恢复和重建这些学科的教学和研究, 与国际大学接轨。在美国富布赖特 (Fulbright) 国际教育交流计划和海外一些大专院校和私人基金会的资助下, 一批又一批来自美国和香港的社会学教授来到中国帮助重建社会学系。中山大学是国内最早重建社会学系的几所大学之一, 于 1982 年恢复招收社会学研究生。在那段日子里, 社会学研究生的很多门课程都由外籍教师讲授, 如社会学概论、社会学研究法、社会心理学、都市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等。我当时留校到社会学系当助教, 主要是辅导研究生的英文和担任一些翻译工作。美国的社会学教授到中大讲学, 我有幸担当他们的翻译, 从中得到了很好的学习机会。我第一次接触到西方古典社会学开山鼻祖的名字和他们的理论, 如孔德与实证社会学, 韦伯和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涂尔干和他的《自杀论》, 还有西方社会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的诠释, 等等。一大堆貌似熟悉实则抽象深奥的概念和术语, 如社会结构、社会分层、阶级冲突、社会不平等, 还有方法论和统计学那些陌生的概念, 如因变量、自变量、相关系数、回归方程, 既令我眼花缭乱, 也令我好奇着迷。我一下子就被这门学科的严谨的方法和精妙的理论所倾倒。从此, 我对社会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不过, 我能最终踏上社会学研究之路, 有一半要归功于幸运。我为之当翻译的那几位美国社会学教授, 在课堂上激发了我对这门学科的强烈的求知

① “社会学”一词在中国最早出现在严复于 1903 年翻译的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 1906 年被列入大学课程。1912 年中华民国的成立及随后的社会运动, 尤其是 1919 年的五四运动, 在大学中推动了对社会思潮、社会问题和社会学的研究。到 1947 年为止, 中国大约有 20 所大学建立了社会学系。中国的社会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学界的影响, 先是通过翻译欧美的社会学论著, 而后又通过吸收、消化和结合西方社会工作学和社会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 在中国缓慢地发展。1952 年, 社会学作为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学科被取消。1979 年中国改革开放, 社会学系才得以恢复和重建。(详见 Pen-wen Sun, “Sociology in China”, *Social Forces* 27, 1949, pp. 247-251; Yanjie Bian and Lei Zhang, “Sociology in China”, *Contexts* 7, 2008, pp. 2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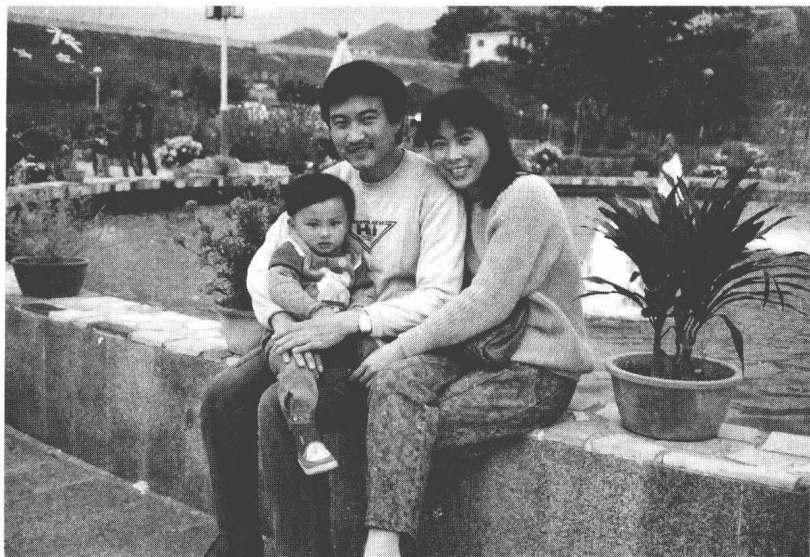
欲，在课外的交谈中也为我介绍了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的情况，使我萌发了考研的冲动，对出国留学也开始动心。不过，我对国内研究生的入学考试还是感到心有余悸，出国留学更是犹如天方夜谭，不可思议。后来我鼓起勇气，在一位到中大讲学的社会学教授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申请了他任教的奥尔本尼纽约州立大学（SUNY-Albany），被录取为社会学硕士研究生，还获得了部分的奖学金资助^①。从某种意义上说，进入社会学领域，并非我的主动选择，而是偶然的机会使然。假如当时我是为人类学的教授当翻译，我很有可能就会去学人类学了。

1984年仲夏，我撇下了丈夫和不足10个月大的儿子，离开了我的双亲和姻亲以及我的亲朋好友，只身飘洋过海闯荡美国。此外，我还放弃了中大这所名校的教职——当时对于一位年轻的女性来说，这份工作是相当理想的，更不用说离开了舒适的家庭和经济开始腾飞的五羊城。在这之前，我从未离开过中国国土的半步，就连上海和北京都未曾涉足，更不用说飞越太平洋了。那时我刚满28岁，在美国人的眼中，我倒像是来自欠发达国家的一个发育不良的高中生。^②我天真单纯，对美国研究生院的学习和国外的生活一无所知，毫无准备。此外，我的经济状况也十分拮据，我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下飞机的时候，兜里只有50美元。不过，我却像久旱的大地，期盼着能像海绵一样吸收新的知识养分。同时，我很实际地为自己确立了一个可行的目标，要在两年之内拿下硕士学位，然后打道回府。我想，只要能在较短的时间内集中精神、竭尽全力地去实现这个并不太高的目标，我个人和家庭所做出的牺牲也就值了。

我从广州乘火车到深圳，拖着两个装满衣服和书籍的大皮箱，拿着从香港到纽约的往返机票和美国留学生签证，步行过罗湖桥边境，然后直奔香港启德国际机场。我万万没想到，飞离香港的那一刻，会是我人生轨道上的一个全新的起点。在奥尔本尼纽约州立大学，我勤工俭学，夜以继日，刻苦攻

① 美国著名华裔社会学家林南（Nan Lin）教授是当时来中山大学讲学的美籍教授之一，当时是奥尔本尼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他热情地鼓励我留学美国。时任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的何肇发教授也鼓励和支持我出国留学深造。因此，我便申请了林南教授任教的那所大学。由于林教授的极力推荐和帮助，我被奥尔本尼纽约州立大学研究生院录取，还获得了免学费和半额奖学金。但我不知道奖学金是在开学一个月以后才发放的。当我从纽约乘坐灰狗长途汽车到奥尔本尼时，口袋里只剩下10美元了。又是林教授为我解围，借给我400美元，支付住房押金和第一个月的房租和伙食费。

② 我在奥尔本尼纽约州立大学的念博士的那几年，确实经常被邻居和朋友误认为是高中生。



作者 1985 年冬回国探亲的全家福

读，用了 15 个月的时间便拿下了硕士学位。在导师的鼓励下，我继续努力，攻读博士学位，又花了三年时间，终于在 1989 年春获得了博士学位。那年 5 月，我把行李和书籍打包运回中国。毕业典礼的次日，我跟导师和教授们以及同窗四年半的同学们挥泪道别，还是从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飞离美国。

当时我已经准备好回到母校中山大学的社会学系任教，但我在回国路上先绕道到瑞士过暑假。当时我丈夫外派到瑞士工作，我 5 岁的儿子也正在那里探亲。离别四年半，一家人终于在瑞士一个叫弗里堡的小城相聚了。当时我打算在瑞士修整一下，度度假，然后再带着儿子回国。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抵达瑞士不到 10 天，北京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学潮，这一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完全打乱了我的回国计划，也改变了我的人生和职业的轨道。我从传媒中得到的消息一下子令我不知所措，进退两难。一方面，我像在海外的大多数留学生一样，不明就里，担心我们这些在西方受教育的学人会受政治牵连而不敢贸然回国。我父母劝我不要相信西方媒体片面的反华宣传，但他们也同意我先不要急于回国，等形势明朗后再作打算。另一方面，我很清楚留在瑞士是没有前途的。我既不懂法语，也不懂德语（这两种都是瑞士的官方语言），根本不可能找到份像样的工作，更谈不上能在大学里找到

教授职位。^① 返回美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非有雇主马上雇佣我，替我办工作签证进入美国，或者有直系亲属申请我移民美国。而这两种可能性对于我来说有如镜中花水中月，绝无可能。还好，天无绝人之路，幸运之神再次降临。在我的导师和一些教授的热心帮助下^②，我越洋向美国学术界求职，结果很幸运地获得路易斯安那州州立大学的教职，因此拿到了美国移民局发的工作签证，顺利重返美国，随后便在美国安家落户了。

1990年7月，我从瑞士飞往美国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州立大学（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走马上任，任社会学系的助理教授，开始了我的学术生涯。1994年7月，我转到了西部名校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任助理教授，1997年获终身副教授职位，2000年提升为终身正教授。这是一条漫长的奋斗之路。我在1984年来美国留学的时候，英文水平有限，社会学知识更是犹如一张白纸。经过了不懈的努力，跨越了无数的障碍，“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才取得了令自己感到满意、也令同事和朋友感到骄傲的成绩。我的学术兴趣始于对美国少数族裔聚居地和移民社会经济适应模式的研究，从而扩展到更广的课题，包括美国移民聚居郊区、新移民第二代的成长和教育问题、新移民的收入模式和就业状况、少数族裔企业家创业精神、少数族裔组织（如移民社团、少数族裔语言媒体、少数族裔课外辅导教育等）、东南亚难民的安置和社会适应等，还包括一些国际移民研究的课题，如亚洲国家之间的移民现象和趋势、跨国移民、中国侨乡研究、海外华人社会等。我所作的研究，除了得益于我所学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外，也得益于吸收亚美研究学、少数族裔研究学、美国研究学和国际区域研究学等交叉学科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我的研究有机地运用了定性和定量的多元分析方法，既重视第一手原始资料的收集，也充分利用现有的第二手资料。我对自己的研究工作充满激情，同时，我深感幸运：我的奋斗路上的每一步，无论顺境或逆境，都有家中亲人作坚实的后盾，都有朋友、同事和学

① 我在瑞士很努力地找工作，却到处碰壁，一无所获。于是我在简历上隐瞒了我的博士学位，不久后在一家国际航运公司里找到了工作，当公司总裁行政秘书。

② 当时如果没有我的导师约翰·罗根（John R. Logan）教授的鼎力相助，我根本不可能在国外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向美国大学申请教职并获聘任。罗根教授是美国著名都市社会学家，当时是奥尔本尼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系的系主任，当他知道我的困境之后，十分关心并伸出友谊之手相助。那时还没有普及电子邮件，罗根教授建议我买一台传真机，然后把认为适合我的招教信息传真给我，我把简历和求职信传回给他，他再把我的申请材料整理后以我的名义发送出去，并极力举荐，助我求职。

生的真诚相助。他们一如既往，每时每刻都为我提供精神上 and 实质性的支持。另外，我也十分感谢奥尔本尼纽约州立大学、路易斯安那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加州大学、联邦和地方政府的研究机构和计划以及多个私立基金会，它们为我提供过各种不同形式的研究资助。

本书既是中山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丛书”之一，也是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与中山大学“985工程”三期人文社科自主创新建设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以及中山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的成果之一^①。我想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通过此书来反思我作为社会学和亚美研究学学者的切身体会和实践经验，与我的同事、学生和其他有兴趣的读者分享我的理论思考和研究成果。本书分成四章。第一章探讨美国“唐人街”作为一个少数族裔聚居区如何影响新移民适应和融入美国社会以及它的潜质和独特功能。第二章从更广阔的视角构建一个社区研究的理论框架，通过分析各种不同形态的移民社区来验证这一理论框架，并运用它来剖析族裔特质与移民社会适应的关系。第三章通过具体的案例阐述“分层同化论”——当代移民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颇具争议的新理论。第四章探讨社会学与亚美研究学两大学科的发展状况以及两者之间学术碰撞的有机结合。最后，我用跋言的形式，结合本人的经历和经验对上述几个理论命题作出综合性的总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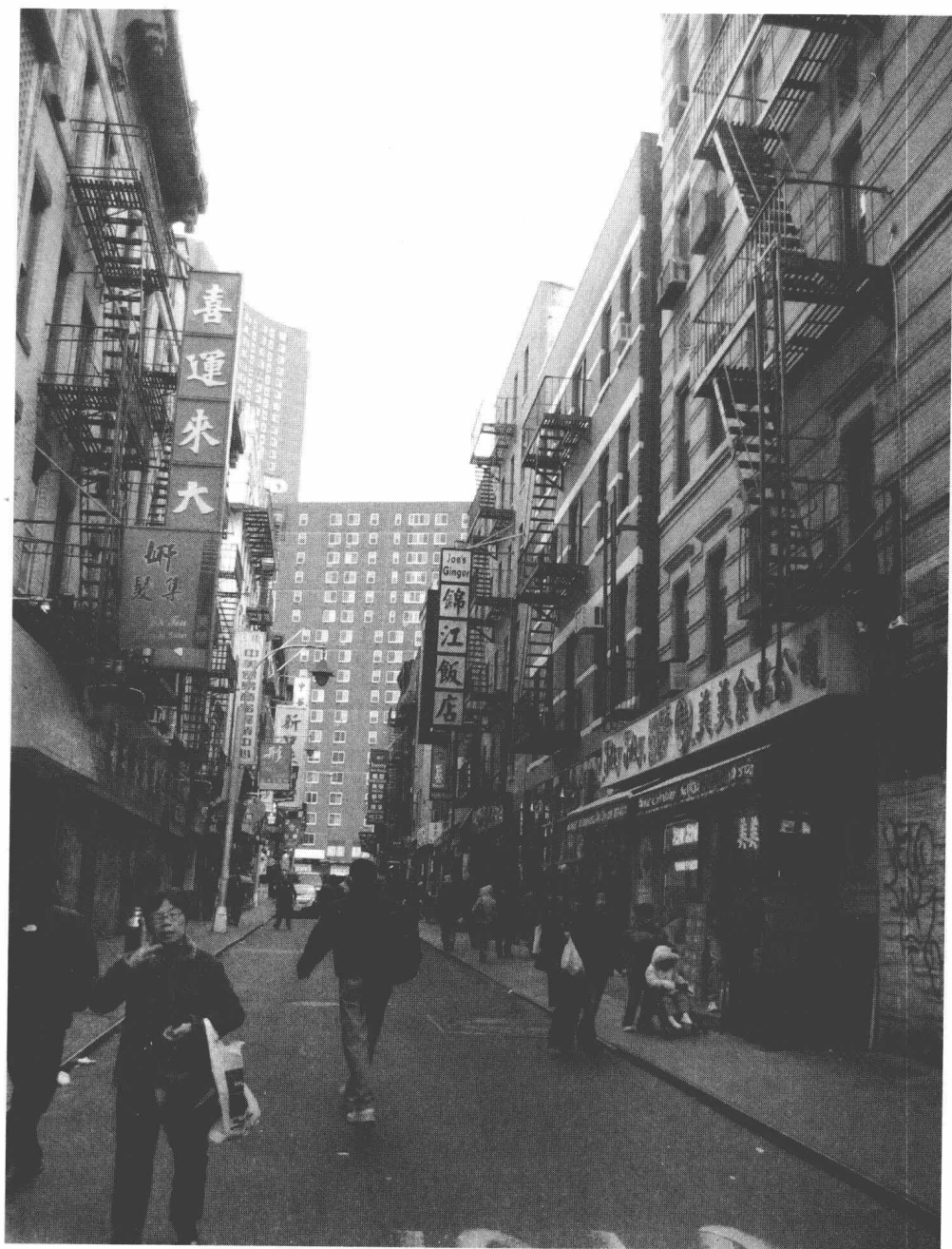
最后特别感谢我的终生伴侣和朋友郭南教授。他一如既往，不仅给我的生活带来无限的乐趣，还孜孜不倦地为我的英文论著做中文翻译和译审。对本书稿也不例外，他不仅对英文本认真地翻译，还对全部译文逐字逐句地进行了认真的校对和润色，使之文笔流畅，如行云流水。

谨以此书献给我儿子郭伽。他很幸运——能够随心所欲地去追寻自己心中的梦想。

^① 本书是在我的英文版著作 *The Accidental Sociologist in Asian American Studies* (洛杉矶加州大学亚裔研究中心出版社 2011 年版) 的基础上翻译和重新书写而成。中文版在原著的基础上，根据中文读者的需求作了较大的增删。在此，我谨向中山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丛书”的主编刘宏教授、顾问陈春声教授和编委刘志伟教授以及洛杉矶加州大学的唐·中西 (Don Nakanishi) 教授和梁志英 (Russell C. Leong) 教授致谢，由于他们的鼓励 and 大力支持，我才得以撰写本书。同时还要感谢中山大学评审委员会极具参考价值的评审意见，以及中山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和中山大学出版社的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我的学生助理——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黎相宜、硕士研究生雷森远，洛杉矶加州大学本科生车荔和锡拉丘兹大学 (Syracuse University) 博士研究生刘岩参与了本书中文版的部分翻译和资料整理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2010 年全家福



纽约市曼哈顿唐人街

目 录

序 言	I
第一章 移民聚居区与族裔经济：美国唐人街的社会学研究	1
第一节 为什么要选择唐人街	2
第二节 聚居区族裔经济理论	5
第三节 唐人街聚居区族裔经济的结构	10
第四节 聚居区族裔经济的特殊功能：华人移民的社会适应模式 与性别差异	15
第五节 融入与隔离：地域性社会流动的动因和结果	25
第六节 结 语	32
第二章 超越唐人街：从社区的视角剖析族裔特质与移民社会 适应的关系	39
第一节 族裔特质与相关概念的理论探讨	40
一、文化与结构	41
二、居住街区与族裔聚居区	42
三、组织完备性	44
四、社会资本	45
第二节 族裔资本的再生产：新老华人社区的比较	48
一、传统华人社区族裔资本的再生产	49
二、新华人聚居郊区族裔资本的再生产	52
第三节 聚居区族裔经济的非经济效应	57
一、族裔经济的社会镶嵌性	58
二、华裔和韩裔移民社区族裔企业的发展	60
三、聚居区族裔经济和社区建设	63

第四节 结 语	68
第三章 分层同化论：新移民第二代研究的理论突破	69
第一节 经典同化论的理论回顾	70
第二节 分层同化论的诠释	75
第三节 亚裔新移民第二代在美国成长：机遇与困境	79
一、亚裔新移民第二代：在成功的背后	79
二、多层次社会整合模式：越南难民子女在美国成长的 社会学研究	84
第四节 结 语	91
第四章 跨学科的挑战：社会学与亚美研究学的学术碰撞与有机结合 ...	93
第一节 亚裔美国人：泛族裔身份的重要意义	94
一、美国式的矛盾：包容与排斥	95
二、族裔身份的形成：移民的第一代与第二代的视角	96
三、演变中的族裔身份：象征性与工具性	100
第二节 亚美研究学：美国高等院校一个新学科的诞生与发展	102
一、亚裔平权运动与亚美研究学发展的历史背景	103
二、亚美研究学的定义和教学科研方向	105
三、亚美研究学的多学科性和跨学科性	109
第三节 跨越学科疆界：机遇与局限	113
一、亚裔学者与社会学芝加哥学派	113
二、亚裔社会学与亚裔学者的“局内人”身份	115
三、亚美研究学与社会学学者的“局外人”身份	119
第四节 结 语	122
跋言：在偶然的背后	125
作者简介	135

第一章

移民聚居区与族裔经济：美国唐人街的社会学研究

我的学术生涯始于研究纽约市的唐人街。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在奥尔本尼纽约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专业是社会学，更准确地说，是城市社会学，而移民社会学和亚美研究学是我在 90 年代中才涉足的。移民社会学的研究范围涉及较广，但可简单地分为跨国界的人口流动（international migration）和移民在移居国的社会适应（social adaptation）两大领域，后者则与城市社会学所关注的许多论题重叠，如城市移民聚居区与少数族裔贫民区、城市居住模式的种族隔离与同化等。

为什么会选择唐人街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课题，当初连我自己都不清楚。我生长在中国南方珠江三角洲的一个著名侨乡中山。中山有几百年的国际移民历史，19 世纪中叶以后直到“二战”以前，有很多人远涉重洋，去了北美和南美洲。我至今还依稀记得童年时祖母常给我讲的枕边故事。在她言谈之中，美国和别的国家不同，美国是一座“金山”，她把去美国打工的乡亲形容成去“掘”金山，去南美洲的乡亲则说成是被“卖猪仔”当苦力。她还说金山里有唐人街，乡下人到了那里就成了“唐人”，唐人住在唐人街，在那儿可以讲唐话，吃唐餐，给唐人的老板打工，不必遭洋罪。不管当初是富是穷，那些乡亲去了几年金山，个个都会变成人人羡慕的“金山客”。那时候，金山对我来说是那么遥远，唐人街是那么充满异国情调，那么神秘虚幻，那么扑朔迷离。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有这么一天，我会走进金山，踏入唐人街，还研究起唐人街来。

第一节 为什么要选择唐人街

为什么要选择唐人街作为我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课题？这是我的研究生和本科生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唐人街是我进入美国的第一站。当我初次踏入唐人街时，对此仅仅是好奇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学术兴趣，更不会想到一个华人移民聚居区也可以成为社会学的研究课题。

1984年夏末，我从香港直飞纽约，纽约离我就读的城市奥尔本尼还有240多公里，需在城里过夜，然后再乘坐灰狗长途汽车或火车前往目的地。那时在纽约我只有一个朋友，他一年前才移民美国，除了他，我在这个城市里就再也没有其他熟人了，可谓人地生疏，举目无亲。我朋友的一家人对我非常热情，我一下飞机就把我接到他们在布鲁克林区租的房子住上几天，倒倒时差，也顺便带我游游这个举世闻名的大都市。抵达纽约的第二天清晨，我便跟着朋友的一家人到唐人街喝粤式早茶去了，随后还跟他们一起去了曼哈顿（Manhattan）金融区的世界贸易中心和华尔街，登上了当时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如今已被毁了的110层高的双子星世贸大厦的楼顶。

记得那天我一走出地铁的唐人街站，立即就被一幅奇妙的异国都市风貌和多元异族文化交错的景象所震撼，至今还留下栩栩如生的记忆。在那里，宏伟壮观、富丽堂皇的摩天大楼近在咫尺，与陈旧脏乱、熙熙攘攘的唐人街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我立即被这片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华人移民“飞地”吸引住了。在此之前，唐人街对于我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关于金山客的虚无缥缈的故事。在那些狭窄拥挤的街道两旁，五花八门的大小店铺鳞次栉比，商铺招牌上写着熟悉的中文大字，地摊、货物和小贩的手推车密密麻麻，与熙来攘往、人头攒动的行人一起挤在拥挤不堪的人行道上，饭馆的橱窗里吊着一排排的叉烧、烤鸭、酱油鸡和各种卤味，空气中还不时地飘来广式点心的香味、炒杂碎的油腻味、各种海鲜的腥味，还有垃圾的腐臭味……所有的这一切都掩盖在曼哈顿下城区高楼大厦的阴影之下，相映成趣。最令我震惊的是东方古老的传统文明和西方超前的先进文明这两种貌似不可调和却又有机地交织在一起的文化景象。唐人街的外观就像停留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像是一个为拍摄电影而在闹市中临时搭砌的场景。我不禁好奇地嘀咕，唐人

街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它到底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在如此现代化的大都市中还能容许它的存在？为什么过了一个多世纪后它还如此蓬勃兴旺？住在别处的华人为什么还是对此一往情深，还要不时地去光顾？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其实我心里嘀咕着的这些问题都是很有意义的社会学问题。我之所以会有这些问题，是因为唐人街既生疏又熟悉，既有它独到的特点，也有它与别的移民社区所共通的性质。后来读了一些城市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如社会学家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所著的《城市村民》和社会学家杰拉尔德·萨托（Gerald Suttles）的《贫民窟社会秩序》等^①，我才受到了进一步的启发。因此当我在考虑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时，唐人街也就很自然地成了我的首选。但是应该如何入手，我却没有半点把握。当时我对华人在美国的境遇一无所知，也对美国社会排华的历史背景和移民政策效应、华人被主流社会所歧视和边缘化，以及华人为自由平等而不懈抗争的政治运动等问题知之甚少，可以说是一点理论基础都没有。另外，在我就读的社会学系里，当时也没有一个研究亚美社区的教授。

我选择唐人街作为研究课题，除了一些朴素的感性认知，其实更多的还是出于一些非常实际的考虑。其一，我的初衷是要以最快的速度拿到博士学位后回国。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家庭原因，二是经济原因。我离开丈夫和10个月大的儿子独自赴美求学，如果不尽快学成回国与家人团聚，就会有负于我的家人所给予我的信任和支持。另外，我是一个自费留学生，在学校里拿到的奖学金很有限，对如何申请校内外的科研经费也一无所知，再说许多科研项目的经费是不面向外国留学生的。多呆一个学期的学习和生活费用有如天文数字，不快不行啊。

其二，研究唐人街，我可以充分利用我来自侨乡的社会资本。我的母语是粤语，还略懂中山和五邑侨乡的好几种主要方言。我在侨乡的很多亲戚朋友在美国这边的关系很多，可以为我铺路搭桥，通过“滚雪球”的方式建立起我自己的乡亲社会关系网。熟悉族裔语言和现成的族裔关系网成了我进入唐人街的关键，为我的田野调查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容易赢得研究对象的信任和支持，使我可以较为轻松自然地出没于各类企业、商家和文化场

^① Herbert J. Gans, *The Urban Villagers*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2); Gerald D. Suttles, *The Social Order of the Slum: Ethnicity and Territory in the Inner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